

# 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

——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

陶恒生

## 前言

连士升（一九〇七～一九七三）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燕京大学攻读经济学时，为在燕京兼课的先父陶希圣所器重，他经常为《食货》杂志



連士升(一九〇七～一九七三)

撰文，两人亦师亦友。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又共事于香港“国际通讯社”，公私关系更臻密切。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连士升携眷逃离香港隐居越南，战后几经播迁，于一九四九年举家定居新加坡，迭任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主笔、总编辑，南洋学会会长，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发起人、政府公共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六三年荣获新加坡元首颁赠勋章。连士升毕生笔耕不辍，著作丰硕，计出版书二十三本，包括游记、散文、传记（甘地传、尼赫鲁传、泰戈尔传）、信札（海滨寄简八本）等，是南洋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代声誉卓著的

报人及文学家，享有“南洋鲁迅”之美誉。连家子女多年来一直设法联络陶家子女，二〇〇八年十一月终于成功与作者取得联系，一年后在新加坡会晤。故人后代在南洋海隅亲切相见，回顾往事，感触良深，遂相约于来年连夫人八八米寿之时，再来狮城欢聚。

## 从《食货》说起

翻开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食货》半月刊创刊号，目录上的作者及其著作，按顺序是：鞠清远〈汉代的官府工业〉，何兹全〈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李旭〈魏晋南北朝时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黄谷仙〈天宝乱后农村崩溃之实况〉，全汉升〈宋代都市的夜生活〉，及主编陶希圣的〈王安石以前田赋不均与田赋改革〉。十二月十六日出版的第二期，载有武仙卿〈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和全汉升、傅安华、鞠清远等人的文章。这些作者，还有后来加入的杨联升（第一

卷第五期)、张家驹(第六期)、曾谿(第七期)、连士升(第八期)、李秉衡(第九期)等人,大多是所谓“食货学派”的支持者,后来成为《食货》半月刊的基本或长期撰稿人。其中李秉衡、连士升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还有文章刊出。《食货》半月刊于这年七月一日出版第六卷第一期后,即因战事停刊。<sup>(1)</sup>

父亲于一九二九年上海与友人合开新生命书局,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创办《食货》杂志。《食货》半月刊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创刊,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停刊的二年半中,前后共出版了六十一期,刊发一百五十多位作者的论文三百四十五篇,其中父亲一人的论文就有三十六篇,其他七篇,翻译二篇,共四十五篇,居作者之冠。《食货》由父亲一人独力组稿编排校对,每月逢一日、十六日出刊,从不脱期。须知当年并无电脑文字处理技术,他花的工夫和时间,恐不止十倍于今日。

### 陶希圣的“亲兵”

《食货》作者群中的何兹全、鞠清远、武仙卿、曾谿,和未在刊物上出现的沈巨尘、萨师炯等人,都是父亲北大时期的学生,他们自称是陶希圣的“亲兵”。何兹全曾说:“鞠、武、沈、曾、萨和我,都是陶先生的学生,鞠清远是北师大毕业的。我们几个都是北大毕业的。这是陶先生的『亲兵』。”何兹全一九三一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父亲那年应聘来北大任教,开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两门课。他又轮流在清华、燕京、师大、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校兼课,很是叫座。何兹全说:“当时,北大最



一九三七年春,陶希聖、恒生(中)、晉生攝於北平太和殿。

受欢迎的教授有胡适之、傅孟真、钱宾四和陶先生四位先生。北伐战争之后,青年学生中最关心的是中国革命的反思和前途问题,由中国革命性质而联系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最受欢迎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陶先生就是运用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社会史问题的。陶先生讲课声音不大,而分析深刻,鞭辟入里,生动有层次,循循善诱,引人入胜,教室里挤满了人。”<sup>(2)</sup>

六名“亲兵”除了曾谿（资生）是湖南人，萨师炯是福建人之外，全是山东人。何兹全初次投稿《食货》时，尚是大四学生，后来逐渐和父亲有较多的接触，课余或周末，常到我们家来。那时笔者五、六岁，晋生四、五岁，常在西城二龙路三十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北師大紅二樓何茲全寓所，（左起）郭良玉、劉德順、何茲全、陶恒生。

三号，或后来北沟沿大乘巷一号家中见到父亲的学生们来访。何兹全说道：“我写了《魏晋庄园制的雏形》寄他，刊在创刊号里。从此，我就常在《食货》上写文章（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成为留在大陆上的“食货派的残渣余孽”）。也从此，我和陶先生开始有了个人间的接触。他住在二龙路，我常去他家。现在记得院子里常有两个四、五岁或五、六

岁的小孩在玩，不知其中有没有一个是现在宋史专家陶晋生师弟。”父亲的几位学生，就是这样跟我们好像一家人似的亲切。他们来我们家，有的是来听父亲讲时局、有的是来研究合写论著、有的是干脆来玩儿的。琴薰姐和泰来哥都跟他们处得很好，我和晋生太小，跳跳蹦蹦，跟出跟进而已。一甲子之后的一九九九年，我们去北师大大红二楼看望何兹全、郭良玉伉俪，两老亲热地叫我们“小师弟，小师妹”，自称“大师兄，老嫂子”，我们相互如此称呼到如今。老一辈的读书人对于辈份的分际，是很认真的。老嫂子已于三年前故去，今年（二〇〇九）四月我们去北京看望九九高龄的大师兄，他除了右耳略背之外，身体仍然健壮。

### 燕京大学的连士升

另外一位《食货》的长期作者连士升，福建福安人，生于书香世家，七岁起在家乡私塾启蒙，继而就读教会办的霞浦作元汉英学校及福州英华斋，打下良好的中英文基础。一九二七年高中毕业，北上考入燕京大学，初习理化，次年转入经济系。他上过父亲在燕京社会系的课，也间或来家中和父亲讨论翻译西方经济史名著的事。泰来哥告诉我，连士升跟那几位山东学生不一样，他比较严肃，不像他们会开玩笑，会闹（我们几个小兄弟最喜欢跟他们玩扑克牌“抽王八”的游戏，大家闹作一团）。连士升比何兹全等人年长四、五岁，一九三一年就从燕京本科毕业了，嗣后留校续念研究院，国学大师顾颉刚介绍他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在特别研究室中得一席位读书写作，同时为著名报章杂志如《东方杂志》、《大公报》、《申报》等撰写或翻译有关中外经济史的文章。他日后回忆道：“在七七抗战前的几年间，我几乎无

日不和这间图书馆接近。假如燕京大学给我以结交几个师友的机会，那么北京图书馆可以说是给我带上治学的门径。”<sup>(3)</sup>

一九三五年，连士升开始为《食货》撰文。父亲在一卷八期（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编辑的话〉中写道：“连士升先生是燕京大学研究院出来的专攻经济史的笃实的学者。他在北平图书馆阅览室里已经两年，他正在翻译世界经济史几部名著，有工夫还调查北平的庙会等经济现象。经济史名著译毕以后，他将根据他的素养，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他在二卷十二期（同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又写道：“连士升先生埋头于各种经济史方法论的研究与经济史名著的翻译，工夫的深苦是通常以一知半解自封自足的人想象不到的。不久他将有长文介绍经济史名家名著给我们。”连士升陆续发表于《食货》的文章，计有：



一九三〇年代的燕京大學學生連士升。

译桑巴德〈经济理论与经济史〉、译克拉判〈经济史的纪律〉、着〈重商制度略说〉、译克拉判〈论经济史的研究〉、译西摩勒尔（陶希圣校订）〈由村落到都市的发达过程〉、译约克曼〈经济史的重要性〉、译西摩勒尔〈由城市经济到领域经济的发达〉（上、下）、与陶希圣合着〈斯密

亚丹论中国〉、译费着〈论原富〉、译卫布思夫妇〈怎样研究社会事实〉，以及他的成名作，在《食货》连载九期的译哈佛学者格拉斯的〈工业发达史〉。总共十一篇，跨二十期。<sup>(4)</sup>

连士升并非所谓“亲兵”的一员，父亲与他在燕京和《食货》结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早年学界有“食货三‘升’”之说，指的是全汉昇（北大）、杨联陞（清华）、连士升（燕京）三位长期为《食货》撰稿的青年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日后都成功为声誉卓著的一方学者。连士升后来在香港工作时与父亲过往甚密，一直称父亲为老师或“先生”。《食货》于一九七一年在台湾复刊为月刊，已成名的全、杨二人仍勤于为月刊撰稿），这是后话。

父亲在《食货》第五卷十二期（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的〈编辑的话〉上写道：“主编者下学年秋季起，北京大学教授满六年休假。休假期间，游览并考察西北、中部、西南中国。主题是牙行的崩溃，银行与钱庄的交替，农业金融。本刊仍

由主编者主编。事务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办理。”没想到二十天后七七事变爆发，父亲不但休假计划泡汤，且阴错阳差地蹈入了政治漩涡，六名“亲兵”也加入了他与周佛海同办的国民党外围宣传机构“艺文研究会”，先后在汉口及重庆郊外的菜园坝办公。连士升则带着妻子郑侃嫔和两岁女儿侨思辗转逃出北平，经天津搭船去了香港。

## 上海去来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父亲随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昆明飞往安南河内，年底转往香港，住九龙太子道，与正在香港岭南大学教书的连士升取得联系。第二年八月，父亲去上海参加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对日和平谈判。鞠清远、武仙卿、曾资生、沈巨尘四人也追随去了上海。四个月后，父亲同高宗武潜离上海回到香港。父亲之决心离开汪组织，并顺利到达香港，除了杜月笙、黄溯初、徐寄庠、万墨林等有力人士多方协助营救之外，连士升向母亲提出的真诚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起，汪精卫等人和日本军方代表在虹口六三花园及愚园路举行了十二天正式会议及会外商谈，双方歧见甚深。父亲与众人困居警卫森严的愚园路楼房，形同软禁，乃密派鞠清远回香港，告诉母亲自己的处境。鞠清远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港，母亲和琴薰姐深知父亲欲脱身而不能的痛苦，乃请连士升前来共同商量。鞠清远带来的消息，是汪方可能年底在日汪密约上签字，连士升听后非常激动不安，认为事态危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年底以前把老师解救出来，必要时他愿意亲赴上海设法营救。母亲思考之后说：“我带儿女去，才能解救他离开愚园路，先回到住家，再想办法”。他们说：“师母和弟弟妹妹们都陷入虎口，又如何得了？”母亲说：“我打算全家人都在上海住下来，汪周纔不会怀疑，七十六号也不会监视，老师纔有脱走的机会。”去上海之事就这样决定，母亲命令琴薰、泰来、恒生三人立即办理休学手续（分别是培道中学、岭南中学和九龙塘小学）。

十二月十一日，母亲带了我们姐弟五人到尖沙嘴码头搭船，连士升赶来相送，登船之际，连士升殷殷叮嘱我们保重，早日归来，分手时他已泪流满面，一直站在码头上等到轮船启碇，才挥手怏怏而去。第三天，我们大小六人出人意料地抵达上海。到后，立即托学生在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思南路口）租下一所房子，父亲乃借故离开愚园路，搬来与家人同住，白天仍去愚园路开会。为掩日汪耳目，三个大孩子都去学校报名，缴费上学，装做准备在上海长住的样子。

十二月二十六日，汪方决定三十日与日方共同签字。高宗武和父亲见事已不可



为，遂决定离开上海。一九四〇年一月四日（高宗武的回忆录记为五日），两人化名从外滩登上赴香港的“胡佛总统”号轮船（高宗武记为“柯立兹总统”号）；十三日，母亲带着晋生、范生两弟离开上海；琴薰姐、泰来哥和我，因受特务监视，蒙杜月笙门人万墨林策划营救，于二十二日抵达香港。轮船徐徐航进维多利亚港之际，正是香港《大公报》以头条揭露“日汪密约”之时。船靠九龙码头，我们已远远看到连士升在码头上挥手，一下船，连士升便飞奔过来，双手把我们三人紧紧围住，连声说：“回来了！回来了！”此刻他已泣不成声。<sup>(5)</sup>

回香港后，琴薰姐回培道，我回九龙塘。泰来哥不想再回远在新界的岭南中学，连士升乃介绍他进香港华侨中学借读半学期，又替他在学校附近找好一间宿舍，免他每天往返过海之苦。学期终了，泰来哥正式考入培正中学。琴薰姐一年后考取西南联大，束装去了昆明。

## 国际通讯社

一九四零年六月起，父亲在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分寄国内各地，以供战时首都重庆领导人士参考，以及关心世界局势及国际问题的机关和个人用作材料。这份刊物选译国外报章杂志的论文，间亦刊载社友们的国际时事评论。



九龙柯士甸道 148 号楼房至今仍在，二楼左边为当年住家，右侧半圆部分为“国际通讯社”办公室。（作者摄）

“国际通讯社”的编译器，有连士升、戴杜衡、林一新、李毓田、唐锡如，洪力生、黄蔷薇……诸先生。每期所载的论著都出自各人手笔，译稿则取材自几十种英、美、日、俄等国出版的书籍刊物。“国际通讯社”还受中央通讯社的委托，向香港“别发洋行”

（Kelly & Walsh Co.）代购军事外交方面的英文书籍。

连士升为经济史专家，时在岭南大学任教。戴杜衡及林一新为经济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有甚深的研究，林且精通俄文。李毓田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之经济学者。唐锡如精研英美文学。洪

力生为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法学博士，长于国际法。黄蔷薇女士即洪夫人，长于英美文学。父亲聘请香港著名体育家、注册会计师余启恩管理会计及官署联系事务。远在重庆的何兹全也帮忙搜集资料，他回忆道：“陶先生在香港办了个‘国际问题通讯’，由我每周把重庆各报的社论和时事评论文章剪了寄给他，我并写一篇一周时事评述。陶先生每月寄我三百元。这时期，陶先生和我不断通信，讨论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sup>(6)</sup>

“国际通讯社”位于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一幢黄色三层双并式楼房，父亲租下了二楼全层两个单位，左边我们住家，右边将客厅和主卧室打通，作为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午餐，每天由母亲在左楼亲自张罗，中午送至右楼办公室。通讯社后面书房里，四壁全是父亲买回来的书籍。其中主要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印的《四部丛刊》初、二编，《丛书集成》，以及上海中华书局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一共有四万多卷。

连士升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从北平携妻带女逃来香港，经由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介绍进入《港报》，十月开始工作，不料不到三个月，报馆即因负债累累而倒闭。为缩小开支，只好把妻小搬到澳门亲戚家暂住，趁此机会完成未翻译完的哈佛大学格拉斯教授的《工业史》下半部，于次年（一九三八）二月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五月，妻子郑佩嫔从澳门搬回香港，因为逃难贫困及操劳过渡，患上心脏病，群医医治无效，不幸于八月三日与世长辞。

一九四〇年，连士升与燕京同学罗牧的胞妹罗梅结婚。他们的婚礼，在香港中环德辅道“告罗士打酒店”（Gloucester Hotel）举行。父亲担任男方主婚人，罗牧为女方主婚人，证婚人是鼎鼎大名的文学家许地山（笔名落华生）。我们全家都参加婚礼，新娘很年轻，大家都叫她“罗小姐”，她是越南华侨，随兄在香港岭英中学求学。一九四一年，连士升担任港大校外考试委员。连家的男孩亮思这年在香港出世。

## 港九沦陷与逃难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天清晨（夏威夷当地时间），日本未经宣战，突然偷袭珍珠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毁伤美国军舰十八艘、飞机二百六十多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于同一时间大举进攻关岛、马尼拉、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十二月八日，星期一上午，日本轰炸机三十多架飞临九龙上空，向启德机场投弹，九龙城起大火，黑烟

滚滚，延烧数小时不熄。当天晚上实行彻底灯火管制，港九一片漆黑死寂，行人绝迹，前线枪声不断，甚为恐怖。

十一日，英印军从九龙退出，日军尚未开进，治安濒临真空。此时盗匪四出，挨户打家劫舍，抢夺、掳掠、放火、杀人的事件，层出不穷，九龙一夜之间变成无法无天的恐怖世界。整条弥敦道上一千多家行号店铺门窗全被砸碎，内部抢劫一空，街上的汽车、巴士、军车全被翻转破坏，脱掉的军警制服、丢弃的钢盔随处可见，最怵目惊心的是满街被自己人打死的尸首。

由于亚皆老街的公寓连遭匪徒洗劫，我们不敢住下去，乃搬到山林道一间小公寓暂住，泰来哥留守亚皆老街。从这天起，大家都生活在隆隆炮声和匪徒威胁的恐怖之中。

十二日，日军进入九龙，每条街道上的商店和住宅，都挂起太阳旗。人们扯一块白布，用红墨水涂一个圆形在布上，那就是太阳旗。日本军队在九龙架起炮台，轰向港岛，英军也猛烈还击。

十六日晚间，英军从香港发炮，轰击九龙的天文台，有一炮恰巧打到山林道住房的后进，房间的窗上玻璃寸寸破裂，大量玻璃碎片从我们的头上直爆下来，我们竟然都没有受伤。房屋被炮轰破，不能再住，同楼各家住客都在夜间逃离了。父母亲各拿一件破棉絮，背在背上，在我们几个孩子身上各挂一个热水瓶，一家大小半夜里流落街头，天未亮走到亚皆老街铁道桥下，为日军岗哨所阻，远远看得见我家的房子却不能通过。



一九四一年連士升、羅梅在香港與大女兒僑思、兒子亮思。

铁道桥附近山坡上有一座小木屋，木屋主人见我们一家大小坐在路旁，就来问讯。父亲说我们是新界来的难民，一时无法通过岗位，在这里歇脚。他说：“走难遇贵人，你们如愿住在楼上，只要三十元。”父亲决定将房间租下暂作栖身之所。当晚蚊子臭虫肆虐，远处火光冲天，整夜无法入眠。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家大小背着棉絮，挂着热水瓶往九龙塘方向走，找到根德



道徐寄庾先生和黄溯初先生家。徐黄两先生见我们进门，说：“家眷不能久留，希圣暂留此地好了”。当时他们刚用完早饭，粥香扑鼻，引得我们个个馋涎欲滴。五岁的范生弟在沙发旁发现一铁盒“哥顿饼干”，打开盖子里面是满满的，我们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那盒饼干一扫而光，片渣不留。主人及家人看见这群小饿鬼的表现，不禁摇头苦笑。父亲留下，母亲带着我们再回小木屋。

日军在九龙安置的大炮，对香港不断轰击。香港西环货仓、湾仔船坞中弹被毁，北角火力发电厂被炮击爆炸，全港无电，夜间一片漆黑。深夜，香港油库中弹爆炸大火，火柱直冲云霄，半个天通红。十八日，日军开始打登陆战，在鲤鱼门、太古船坞、北角三处登陆成功。十九、二十两日，大队日军上岸，开始大肆杀掠，百姓死伤惨重。

二十三日清晨，忽然解严了，我们连忙快步穿过铁道桥哨岗，日本兵不再拦阻。回到家里，母亲看到泰来哥，不禁眼泪直流说：“你还在！”母亲真的以为大儿子已经死在日本兵手中。下午，父亲也赶回来了，一家人总算平安团圆。

二十四日，登陆日军与英军短兵相接，发生巷战。二十五日圣诞节，英军已无应战能力，日军从九龙以扩音器喊话威胁，如不投降即粉碎港岛，傍晚，港督杨慕琦决定投降，下令守军停火，派代表与日军谈判。晚上九时，港督乘小艇过海，亲自前往九龙半岛酒店向日军司令酒井隆中将投降，束手成为俘虏。

日军占领港九后，这里成为一块治安败坏，粮食不足，钱币无用，流氓讹诈的歹土。我们一家困居在此，每天都为无米下炊发愁，而孩子们的胃口偏偏特别好。开年一月，香港红十字会的胡叙五先生，嘱人通知父亲，说廿八日有一个“惠阳还乡队”出发，要父亲准备。父亲决定带二舅和国际通讯社厨师马师傅的侄儿马子元同行。廿八日清晨，父亲出发就道，行前与母亲相约，倘若她能带着孩子们回到国内，而自己也能脱险的话，在桂林相见。

“惠阳还乡队”总共三十六人，由蒋伯诚领队，父亲虽以椰油涂脸呈棕色，可一露面便被认出，害得队友们提心吊胆。队伍行到大埔，搭上一条渔船，连夜直放沙鱼涌，然后登岸经葵涌、横沥、河源、龙口，到韶关，共走了十七天。父亲从韶关发电报给桂林《扫荡报》。第二天报纸发表父亲安抵韶关的消息。这天正好是母亲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到达柳州的一天。

父亲离港第二天（一月二十九日），友人高彤阶来告，后天有艘疏散船“白银丸”直开广州湾，要我们速整行装，他同我们一齐走。三十一日天未亮，母亲便带

着我们到尖沙咀码头排队搭船。“白银丸”是艘五百吨的小船，谅必是日本内海的一艘渡轮，却挤了上千人。白银丸于十二时正启锚，出鲤鱼门，航向外海，二月一日下午约摸六时许驶抵广州湾的西营海面，没想到法国海关不准轮船进港，命令日本船长原船返回香港，法国警察将舱门封锁而去。难民们心急如焚，日本船员也气得跳脚。到了天黑，岸上的琼崖同乡，弄来两条大木船，把乘客一个个从窗洞接出去跳上木船，木船黑夜靠一小码头，难民偷偷登岸，躲过了法国巡警。

我们到西营住进一家小旅馆，勉强挤着打地铺，休息一夜。次晨去码头领了行李，雇车到赤坎，在亚洲饭店住了一星期，等候重庆的消息。重庆方面由杜月笙派干员范瑞甫来和我们接洽，准备护送我们到桂林。他为我们办好进入华界的通行证，告诉我们去广西准备走的路线。二月九日，高彤阶雇了几乘轿子和几名挑夫，结队步行向郁林出发。

十四日上午抵达郁林，住进一间空荡荡的旅社，原来那天是阴历除夕，员工都放假回家了。十六日乘长途木炭汽车，车行两天，经贵县、大塘，十八日中午抵柳州。我们在公共报栏上看到《扫荡报》的新闻，知道父亲已于十四日到达韶关，孩子们大喜若狂，母亲也喜极而泣。范先生替我们买好火车票，任务完成告辞而去，我们当晚乘火车往桂林。第二天到桂林，住环湖旅社。二月二十日，父亲自韶关乘湘桂铁路火车抵达桂林，一家人重新团聚。父亲随即搭机回重庆，我们在桂林上了一学期的学，于暑期搭长途汽车到重庆。我先读南岸两湖储材小学，次年考入沙坪坝南开中学。

### 连士升隐居越南

连士升一家住在港岛。从十二月十一日到二十五日，港岛居民生活在日军从九龙轰过来的猛烈炮火之下。二十五日英军投降，在日军接管港岛治安之前，全香港也跟九龙一样变成无政府状态，发生抢劫、掠夺、乃至自相残杀的事件。更加恐怖的是日军登陆后，为报复部分英军顽强抵抗而公开虐杀战俘。

最惨无人道的，是驻守赤柱（Stanley）的加拿大守军因与指挥部失去联络，对于香港英军已于圣诞节傍晚正式投降一事毫无所悉，仍旧继续向日军开火至第二天中午。这一举动触怒了日军，招来一场兽性杀戮。在被征用为战地医院的圣士提反书院（St. Stephen's College）里，一百七十多名手无寸铁的伤兵，全部被杀害（包括十五名重伤兵员在床上被日兵用刺刀刺死），七、八名担任护士的修女惨遭奸杀。

连家决定离开香港，设法办好去越南的临时通行证，听到日本疏散船“白银丸”从九龙开往广州湾的消息，连忙设法为罗牧、戴淮清和自己三家买到十四张船票，一早便过海去九龙码头，可惜等船的队伍实在太长，即使手中有票也无法轮到上船的机会。事后想想，如果知道连家也是那天赶来码头搭船的话，我们在前队一定会设法让他们来插队（事实上我们已让林一新插了队）。我们并没有事先买票，而是去得早，高彤阶临时在码头上跟挂着“维持会”臂章的本地人以八张票的钱买到六张票。“白银丸”离港后，连家一行人搭上去澳门的“泉兴丸”，从澳门到广州湾，再转往越南海防。

他们在广州湾住的旅社，极可能就是我们住过的那家一进门便闻到鸦片味的“亚洲饭店”。这家旅店里面龙蛇杂处，赌博、喝酒、抽大烟、狎妓，乌烟瘴气。广州湾是个腐败的法国官员和华人私梟团伙组成的黑社会世界。

连士升带着怀孕的太太，七岁的女儿和不足周岁的儿子，在广州湾流落了两星期，终于搭上了日夜盼望的“多宝”号货轮，于三月十一日抵达海防，第二天坐火车到河内，转往西贡，住入永安客栈。为躲避占领越南的日军耳目，几天后迁到湄公河三角洲茶荣省，开始长达四年的隐居生活。

在茶荣，连士升经朋友介绍，当上一间华侨小学—福建学校的校长，暂时得以安定下来。在穷乡僻壤，简单拮据的生活环境下，他并不气馁，利用课余时间完成翻译克拉判的《现代法德经济史》，接着又翻译克拉判的一百五十万字巨著《近代英国经济史》，不过这本书只翻译了大半，日本投降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完成。在越南的另一大收获，便是二女儿仁思（一九四二），三女儿藩思（一九四四），及四女儿文思（一九四八）的出世。<sup>(7)</sup>

一九四五年战事结束，连士升第一时间的决定就是回归祖国。年底，只身经高棉前往西贡，经马德望、金边到曼谷，然后乘军用机到马尼拉，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抵达上海，逗留两天之后搭机飞重庆。他回忆道：“二月十二日下午六时，我安抵重庆，投宿胜利大厦，第二天便搬到亲友家里去住。”<sup>(8)</sup>他在上清寺我们家借住，我们记得他白天外出访友，晚上灯下写作。

这年一月十六日，国民政府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张莘夫奉命带领七名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苏军的暴行，立即激起了全国学生的愤慨，二月二十二日，重庆各校学生发起“二

二二反苏游行”，沙坪坝各校队伍一路高呼反暴行口号，中午到达重庆市区。经过上清寺时，我看见父母亲、连士升等人在山坡栏杆后面观看，并向游行队伍招手，心情激动不已。

两个月后，连士升离开重庆去南京，在那儿当了半年公务员。由于严重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家眷尚滞留国外，又看到那些养尊处优的接受大员过着豪奢的生活，而一般公务员贫无立锥之地，甚感不平，乃决心离开。他说：“在当时的环境中，我知道自己如在南京住下去，不但债台高筑，陷于无法自拔的地步，而且根本没有办法把家眷接回国。”<sup>⑨</sup>一九四七年一月，他到了新加坡。他原本只是想到马来亚考察两三个月再作打算，没想到国内局势丕变，根本无法回去安居，只好暂时留在新加坡。一九四八年九月，为新加坡《南洋商报》赴巴黎报导联合国第三届大会，顺便在欧洲各国参访。一九四九年正式受聘于《南洋商报》，举家自越南迁往新加坡定居。

### “京派”融入新马

四十岁的连士升，于北方苦读治学十年，南方颠沛隐居十年之后，终于在南洋觅得一处安身之所，开始了人生另一段充满挑战和丰收的岁月。



一九五二年連士升在新加坡。

连士升在南洋的第一份工作，是《中兴日报》特派员，任内曾受命回中国作采访，在南京时，《中央日报》也聘他为特派员。一九四八年，他转投新加坡《南洋商报》，在欧洲采访期间写了大量游记，后来集结成《祖国纪行》、《欧洲纪行》之《塞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大西洋一角》及《印度洋舟中》五部书，由《南洋商报》出版。

连士升初到新加坡马来亚时，带着中国北方学者特有的气质，言谈举止显得渊博自信。他那沉着、理性、超功利、些许学究气、喜欢怀旧的文笔，一方面展现古典色彩，另一方面难掩乡土倾向。他当年初到北平时有个感想：“坦



白说一句，初到福州与初到北京时，我所得的印象刚好是两样。前者是跑进异乡，后者宛若回到故乡。”<sup>(10)</sup>浸润京城十年的文化与乡土养分，使得他不自觉地成为一名“十足的”北京人。

学生时代连士升所追随的导师与崇拜的文人，多属于五四时代的现代主义者。他们接受西方文化，但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生于列强欺凌中国的时代，因此关心政治、热爱国家；他们对社会的不平现象深恶痛绝，因此坚持正义、嫉恶如仇。他们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讲究纯艺术和纯文学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在大幅度认同西方现代人文精神的同时，不能也不愿放弃眷恋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的情怀。这也许就是“京派”文人的特质。

从连士升《回首四十年》书中的〈北京图书馆〉、〈北京的公园〉、〈北京的饭馆〉几篇描写北平风貌的文章，可以窥见他的乡土视角，嗅出他浓厚的“北京味”。他简洁隽永的表达功力，得自深厚的国学基础；他用笔条理分明，逻辑严谨，源自大学时代所受的史学训练；他广阔的国际视野，归功于长期研究及翻译外国经济学名著所累积的学识。

像连士升那样一个有独立个性，有审美能力和批判目光的现代知识份子，一下子掉进一个自己不熟悉，文风迥异的南洋文化圈子里，很难不被那些以本土派自居的华文作家视为异类，或“非本土”、“外来者”。他们对这位文章写得好，外语能力强的中国式现代文人也充满了好奇，尤其是他当上《南洋商报》主笔之后，许多人很想多知道一些这位名报人南来之前的资历，譬如有没有在国民党的机构里做过事，或者转换工作的过程，等等。然而这些琐碎的是非丝毫无损于他正直的人格。



一九五三年於新加坡。(左起)前排：蕭思、文思、仁思；中排：藩思、羅梅、亮思；後排：僑思、連士升。

南洋——或者更狭义地说马来亚——的华文文艺界，在中国抗战期间的三、四

〇年代，大体上是跟着中国的抗战文艺走的。当时就有华文作家反对老是拿中国的题材做蓝本的作法，倡议建立发掘本地题材，反映马来亚社会的文艺体系，他们认为既然生长在马来亚，就不能不认同马来亚社会，那才是马来亚华人的家，而不是中国。唯有这种新的思维，才能表现马来亚文学的独创性。

随着对环境的适应，敏锐的观察和圆润的调节，连士升的著作开始默默地转变。一九四九年定居新加坡以后，他曾写道：“我认为南洋的文化应以当地文化为主体，加上中国、印度、回教文化的旧传统，及欧美文化的新思潮，造成一种和谐的适合当地需要和趣味的文化，这样才能生根，才能繁荣滋长，才能够开花结果。”<sup>(11)</sup>他的大量作品很自然地为新马文化界接受。他于一九五零年被委为南洋学会理事，不过是来到南洋一两年的事。这年的著作，多收入《南行集》和《闲人杂记》。么女萧思于这年出世。



一九六〇年代的連士升夫婦。

一九五二年，连士升受委为南洋大学及新加坡大学校董。一九五四年，出任南洋学会会长、新加坡剧场委员，发表〈当地文艺的特性〉、〈文艺应反映现实〉、〈中国戏剧在巴黎〉等有关戏剧的文章。一九五六年，被推选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发起人兼顾问，此时的连士升已经被公认为南洋文学界的领袖之一了。

一九五三年一月，陈六使在福建会馆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提议创办华文大学，号召华人社会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创办一所自己的高等学府。他率先捐献叻币五百万元，并承诺捐出座落于裕廊律，面积五百二十英亩的会馆土地，作为建校之用，他的号召得到新马侨社热烈响应。二月，建校筹备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定名大学为“南洋大学”，并推连士升出任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宣传组主任。一九五四年，长女侨思高中毕业后赴中国大陆，进北京大学生物系深造。

一九五四年十月，林语堂率教授和管理人员共十一人，应南大筹委会之敦请来到新加坡，准备筹划开办南洋大学；一九五五年四月，因与创办人陈六使及筹委会理念不合而集体辞职离去。六月，大学先修班开始上课；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

南洋大学正式开学，入学新生五百八十四名，分别就读于文学、理学、商学三院，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

一九五七年，连士升发表见证马来亚独立的文章，深为各界重视。一九五九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受命为政府公共委员会委员。

一九六一年初，马来亚总理东姑拉曼倡议由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巴、沙劳越、汶莱组成马来西亚的构想。新加坡与马来亚经过两年多的谈判，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有条件地加入了马来西亚。这年，连士升获新加坡元首颁赠功勋章。

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李光耀通过广播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这年，连士升出版穷十五年心血的《甘地传》、《尼赫鲁传》及《泰戈尔传》三大著作，以及《海滨寄简》一至四册：《物华集》、《天宝集》、《人杰集》和《地灵集》，这些著作可视为连士升送给共和国的一份大礼。<sup>(12)</sup>

这年二月十八日，父亲由泰来哥陪同作环游世界之旅，第一站香港，第二站经吉隆坡来怡保我们家小住及游览。三月二日，父亲及泰来哥飞新加坡，南洋大学诸人及连士升、赵世洵等在机场相接。是晚应陈国础、刘攻芸先生之宴于丰泽楼，席开四桌，老友相聚，备觉温馨。父亲与连士升夫妇自从民国三十五年重庆一别，悠忽二十一载，不胜今昔之感。泰来哥在日记中写道：“连士升先生的太太是安南籍，香港陷落后，他们夫妇到安南，战后又到新加坡定居。连先生是新加坡的大文豪，在政府里地位也很高。父亲和他多年不见，把晤甚欢。赵世洵是上海新闻记者，与沈苏儒同事，一九四九年经香港转来新加坡。”<sup>(13)</sup>

一九六九年，连士升出任《南洋商报》总编辑。一九七一年，因病辞去所有职务。这年秋天，连士升夫妇来马来西亚怡保看我们一家。连先生通过南洋商报怡保办事处跟我连络上，到怡保的当晚，我和内子刘德顺在利口福饭馆请吃广东菜。原籍福州的连先生还是一口京片子，跟以前一样健谈，席间说了好几个在北平上小馆儿的笑话，这些笑话也是父亲常说的。连先生问候我们的“叔叔”和“姆妈”，他知道我们姐弟从小就跟着堂兄鼎来这么叫自己父亲的。第二天我们陪他们逛“霹雳洞”及“南天洞”，中午吃了一餐斋菜，下午他们就回新加坡了。

一九七二年，出版《海滨寄简》的第五、六册《落霞集》及《孤鹜集》。

一九七三年，连士升赴北京探望长年留在北京，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的长女侨思，并拜会恩师顾颉刚先生。返回新加坡后不到两周即感身体不适，于七月九日

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sup>(14)</sup>

《海滨寄简》的第七、八册《秋水集》及《长天集》，由连士升的子女分别于一九七五年及二〇〇七年出版。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五日，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主办“连士升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同时举行《长天集》的新书发表仪式。

### 著作等身扬誉南洋

连士升的著作非常丰富，写作范围极为广阔，他用笔温和敦厚，感情丰富，喜欢意境美的描述，善于比喻而富启发性。他虽被赋予“南洋鲁迅”的美誉，其文字却绝不似鲁迅那么尖刻与充满愤怒。他笔耕不倦，在《南洋商报》、《南洋周刊》和《南洋学报》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游记、书评和论文，前后共出版二十三部书，包括印度三杰的传记，对南洋华文学界贡献良多。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连士升不但是新马文坛上声誉卓著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报人；他关心青年，循循善诱，激励上进，对青年品性的陶冶，影响极为深远，因此在南洋被尊为青年楷模。现在简介他的著作如下：<sup>(15)</sup>



連士升《海濱寄簡》手稿。

游记：《祖国纪行》、《塞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大西洋一角》、《印度洋舟中》。

散文：《南行集》、《名山胜水》、《春树集》、《给新青年》、《闲人杂记》、《回首四十年》。

传记：《泰戈尔传》、《尼赫鲁传》、《甘地传》、《西方英雄谱》。

信札：《海濱寄簡》之：(1)《物华集》、(2)《天宝集》、(3)《人杰集》、(4)《地灵集》、(5)《落霞集》、(6)《孤鹜集》、(7)《秋水集》、(8)《长天集》。<sup>(16)</sup>

连士升对儿女的命名，很有别具匠心之含义：

侨思：纪念春秋战国时期的杰出政治家，郑国宰相子产（西元？—前 522），子产名侨，因系贵族，故被尊称为公孙侨。



亮思：纪念诸葛亮（181—234），字孔明，三国时期蜀汉重要大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仁思：纪念王守仁（1472—1528），号阳明，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和军事家。

藩思：纪念曾国藩（1811—1872），湘军创立者和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晚清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

文思：纪念孙文（1866—1925），即孙中山，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家、中国国民党总理、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国父。

萧思：纪念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音乐剧《窈窕淑女》（*My Fair Lady*）即根据其喜剧作品《卖花女》（*Pygmalion*）改编。

### 狮城聚会 温馨话旧

二〇〇八年十月廿六日，我的网站留言栏上出现一则留言：

恒生世兄：我们是连士升先生的子女，正在整理和重新出版先父的遗作。您是否方便给我们一个地址和电邮址，我们可以寄一些资料给您。敬祝安泰。连侨思。

连士升的子女？这太意外了，超过半个世纪前的点滴旧事瞬间涌上心头！我立即回信（当时尚不知连侨思是连士升先生的大女儿）：

侨思先生：您好！很高兴看到您的留言。连士升先生与先父是极好的朋友，早年在北平（连先生在燕京）就结识，并同在“食货”杂志上发表文章。1940—41年代在香港同办“国际通讯”，后来他去重庆，曾在我们家（上清寺）住过一阵。我最后见到他是60年代在马来西亚怡保，他是特别从新加坡来看我们一家的。望多联系。陶恒生 2008.10.26

十一月十六日，收到连亮思的电邮：

恒生世兄：您好！我是连士升先生的儿子连亮思，在去年我们筹办“连士升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收集资料时，在网上发现您谈关于他和您家交情的文章。当时曾想请您来参加纪念会，时间仓促也找不着您的地址。今年找到您的留言簿，马上联系上了，十分高兴。

先父已于1973年逝世，母亲八十多高龄，她还记得陶希圣先生。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1941年生于香港，在新加坡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妇产医生工作。大姐侨思，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多年，之后移居香港，在香港大学工作到2006年才退休到新加坡照顾外孙。二妹仁思，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毕业后，在英国教钢琴。三妹藩思，澳洲学完会计后，回新加坡从事会计师和保险工作。四妹文思，新加坡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雀巢食品公司的研究发展部门工作，今年刚退休，开始学中医。五妹萧思，在惠普公司工作多年，两年前已退休，现在在中国做企业顾问。

我们六个兄弟姐妹都不是学文的，除了大姐之外，工作环境都是用英文。我们中文还好，上台能讲，执笔能写，这得感谢先父对我们的要求和给我们打下的基础。

先父过早地去世，我们做子女的有义务帮他整理和出版他的遗着，去年在纪念会上发布了他的《海滨寄简》第八集〈长天集〉，今年发布了他的《给新青年》精简版。还有“连士升青少年文学基金”等活动，请看我们附有资料寄给您。

下一步，我们还想收集和整理他在国内的文稿，您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吗？  
顺祝 阖家安康！连亮思 2008年11月16日

经过一年的通信和电话联系，我们决定前往新加坡跟连家的兄弟姐妹们会面。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七日，我去信写道：

侨思姐、亮思兄：我们没忘记今年要来新加坡的初衷，现在决定11月2日启程，4日凌晨1时抵达新加坡，16日回美。在狮城逗留的十几天中，我们最想要做的事，就是拜访你们全家，相聚畅谈。我们将入住York Hotel，4日上午休息，下午会打电话给亮思兄，希望能安排见面时间。周末除星期天上午儿子带我们上教堂之外，都有空。非常期待我们的聚会。顺祝 阖家顺吉，并候 伯母安康！  
恒生、德顺同上 2009.10.17

我们俩于十一月四日凌晨抵达新加坡，当晚七时半，亮思、文思和她的先生高华岳来旅馆大厅相见，接我们去美国俱乐部晚宴。我到餐厅见到连夫人，第一句话“罗小姐”脱口而出，老人家大为惊喜说：“好几十年都没有人这样叫我了！”我坐在连夫人和侨思姐中间，文思夫妇坐侨思右首，德顺坐在连夫人和亮思中间。我们亲如家人，话语不断。连家兄妹最感兴趣的话题当然是他们父亲和我们父亲当年的关系，以及互动细节，我就我的记忆和所知，尽量不厌其详地报告。文思感慨地说：“我们真没想到在世界的另外一角，还有人比我们知道更多父亲早年的事！”

连家长女侨思于一九五四年赴北京留学，至一九七九年才离开大陆，这三十多年间自然经过了各种动乱与冲击。她这晚带来一份从网上下载我八年前写的一篇〈陈六使与南洋华文教育〉的打印本。她说，她是从这篇文章发现我提到她父亲，从而搜寻到联络我的资讯的。

连家独子亮思是新加坡妇产科名医，他著作甚丰，除了大量医学专业文章和书之外，早年曾翻译过哲学家罗素的书《人类有前途吗？》，一九七七年出版名噪一时的《六城记》，其思维与文笔颇有乃父之风。

连家四女儿文思是新加坡大学化学博士，曾在雀巢食品公司研发部工作多年，退休后专心研究中医。她爱好中英文古典文学，曾英译“唐诗”和“宋词”两书。她这晚送我们两盒雀巢研发成功的浓缩中药汤料。

还有两位女儿在国外。她们是在英国教钢琴的老二仁思，和已退休正在努力攻读中文的老三藩思。

十二日，我们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香宫”再聚会一次，这晚多了一位贵客：原定昨晚出国特别推迟一天的连家小女儿萧思。连萧思退休前任惠普公司亚太服务集团高级副总裁多年，手下员工八千多人，曾名列《财富》杂志“美国以外最具权力的五十名工商界女强人”评比的前十名。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於新加坡。(左起)前排：陶恒生、連夫人、劉德順；後排：連僑思、高華岳、文思、陶德興、葉若詩、蕭思、亮思。

宾客坐定后，连夫人说：“上次听你讲故事，大家意犹未尽，今晚还要继续听你讲。”今晚我讲得较多的是一九四一年底日军攻打港九，港九沦陷，及逃回内地的经过。连夫人讲他们在越南躲避日军险些被抓捕的故事。在新加坡工作多年的我

们的儿子德兴夫妇在席间听得津津有味，虽然那些故事发生的年代，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太久太远。

由于萧思要赶夜机飞上海，我们谈到九时半，只好互道珍重依依惜别。连、陶两家上一代的情谊，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由两家第二代在南洋重谱新章；一些记忆中的比较模糊的地带或失落的环节，在相互回忆激荡之下，得以重新填补衔接，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和万分珍惜的机缘！临别时连妈妈抓着德顺和我的手说：“明年一月三十日是我八十八岁生日，你们一定要来哦！一生只有一次喔！”是的，一生只有一次，我们怎能不再回新加坡，为老人家（不，罗小姐）的米寿盛庆，彩衣上寿呢？【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于旧金山】

### 天赐纯嘏 如南山寿

二〇一〇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七时，连夫人的寿宴如期在新加坡四季酒店举行。寿宴的邀请、策划与进行，均由连家小女儿萧思一手操办，参宴宾客二百余人，均为连家的至亲好友。宴会济济一堂，寿星笑口常开，会场充满欢欣气氛。我们在席间认识了连妈妈的弟弟、自唐山远道而来的罗履常夫妇，连妈妈的哥哥罗牧的儿子罗安，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博士……等人，也见到从英国回来祝寿的



二〇一〇年一月三十日於新加坡四季酒店慶祝連士升夫人羅梅女士八十八米壽全家合影。

连家二小姐仁思。主办者安排了许多余兴节目，最精彩的是 *The Singing Doctors*（医生歌唱队），七八名新加坡名医轮流表演独唱合唱，一曲四十年代的独唱老歌“教我如何不想她”，唱得荡气回肠，原来外表严肃的医生们也有活泼调皮的一面。

连家长子亮思要我上台讲几句话，我把连陶两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友谊作一简单介绍，接着把一九四〇年在香港，三十三岁的连士升与年轻漂亮的罗梅在告罗士打酒店举行婚礼的盛况描述一番，并以二〇一〇减一九四〇得七十，八十八减七十得十八，算出罗小姐那时只有十八岁，祝愿八十八岁的连妈妈永远年轻，永远



健康，博得满堂欢笑鼓掌。

连夫人在席间笑说，结婚之前连先生常带她去告罗士打酒店喝咖啡，她紧张得要命，生怕被同学看到。又说：她管教孩子很严，犯错就打，先生见孩子挨打心疼，打完后就偷偷带孩子出去吃冰淇淋，难怪孩子们都不怕爸爸。

寿宴圆满结束后第三天，连家在良木园酒店的岷江川菜馆再宴请我们一次，除了原班人马之外，还有罗履常、寇羨全夫妇，和勤研中国文学，去年十一月因为准备考试没能参加聚会的三小姐藩思。



良木園岷江飯店再相聚。(左起)前排：羅履常、寇羨全、連夫人、劉德順；後排：高華岳、連亮思、陶恆生、僑思、藩思、文思。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热心的许福吉博士亲自驾车，邀请“怡和轩”副主席、新马诗人王如明先生同行，陪我参观“孔子学院”及“陈嘉庚基金

会先贤馆”，许院长并送我一本他主编的《都市文学与社会变迁》。全世界各地共有孔子学院三百余间，新加坡孔子学院在南洋理工大学（陈六使创办的南洋大学之前身）、中国国家汉语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国国家汉办”）及山东大学



新加坡孔子学院。(左起)院长许福吉博士、作者、怡和轩副主席王如明，左侧为连士升铜像及作品展览柜。

国际教育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于二〇〇五年。学院设立了“南大孔子学院基金”及“连士升青少年文学基金”，通过这两个基金，至今已经主办了二百多项语言文化活活动，及陆续邀请世界各地著名专家学者前来作学术交流。学院会客厅一端矗立着孔子塑像，另一端是连士升先生的半身塑像，和著作展示柜。教学区设有电化教室、工作室、图书室、交谊室……等现代化设备。“连士

升青少年文学基金”成立于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五日连士升百年诞辰纪念日，基金会每年拨出一定的款项，作为鼓励全球青少年从事文学创作，促进中外文学交流，和主办青少年美文大赛及推广青少年文学创作之用。许院长说，学院有一项不成文规定，即不论何人，一进门就要说华语（国语）。个人觉得，新加坡的青少年已能普遍掌握流利英语，但对自己的文化传承似乎欠缺较深认识，青少年文学基金在提升民族文化自觉方面，必能收潜移默化之效。

## 可敬的民间社团

历史悠久、抗战期间出钱出力号召华侨救国抵御外侮的新加坡怡和轩，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九日庆祝成立一百一十三周年及会所重建落成典礼的同时，为陈嘉庚基金会所设立的先贤馆主持开幕仪式。先贤馆设立在怡和轩大楼之内，展示陈嘉庚和新加坡其他华人先贤如陈六使、李光前、林义顺等人的历史事迹。我们由先贤馆副馆长韩山元、助理馆长邹璐引导参观及解说，陈嘉庚是怡和轩第二及第四任总理（一九二三～一九三〇；一九三五～一九四七），曾在怡和轩生活了三十多年，他生前的许多重大决定与事迹，都发生在怡和轩；陈六使任第五任总理（一九四八～一九六三），同时担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及中华总商会会长，在此期间所作的重大决定，如维护语言权、争取公民权、发动创立南洋大学等，也都曾在这里讨论和作出决定。怡和轩主席林清如先生特别赶来，在三楼交谊厅会见我们。林清如的令兄，是一九五〇年代与李光耀一同为人民行动党争取政权的左派运动领袖，李光耀成功当上总理后，党内发生斗争，林清祥脱党另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一九六三年被捕下狱，一九六九年获释被驱逐流放伦敦，十年后回新加坡宣布脱离政治，一九九五年逝世。这是题外之话，林清如未置一辞。

历史悠久的怡和轩，在抗战期间出钱出力号召华侨救国抵御外侮。怡和轩主席林清如先生特别赶来，在三楼交谊厅会见我们。林清如的令兄，是一九五〇年代与李光耀一同为人民行动党争取政权的左派运动领袖，李光耀成功当上总理后，党内发生斗争，林清祥脱党另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一九六三年被捕下狱，一九六九年获释被驱逐流放伦敦，十年后回新加坡宣布脱离政治，一九九五年逝世。这是题外之话，林清如未置一辞。



新加坡先贤馆。(左起)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怡和轩副主席王如明、作者、怡和轩主席林清如、先贤馆副馆长韩山元、助理馆长邹璐。

李光耀成功当上总理后，党内发生斗争，林清祥脱党另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一九六三年被捕下狱，一九六九年获释被驱逐流放伦敦，十年后回新加坡宣布脱离政治，一九九五年逝世。这是题外之话，林清如未置一辞。

王如明是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现任南大毕业生协会秘书，他送我他编撰的《呵 这五十年——南洋大学创办五十周年纪念》，及《陈六使百年纪念文集》两本厚书。我们谈到南洋大学从草路蓝缕到发扬光大，中途遭受干扰导致名存实亡的二十五年兴衰史，不禁感慨系之。他问我，如果今天南大还在，该是怎样的情况？我说，看看香港中文大学，从一九四九年的只有几间教室、两三位教师（钱穆、唐君谷、张丕介等学者）的新亚书院，在香港英政府的支持下，发展成今天位列世界前百名，亚洲评比第二的世界级学府，可以想象如南大当年得到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以它广阔校园及华人资源的优势，则其今日的规模与地位，绝不可等闲视之。

我对陈六使的事迹，以及抗战期间三千一百九十三名参加滇缅公路运输线的南侨机工悲壮史特别感兴趣。陈六使是我早年（一九六三～一九七七）在马来西亚怡保服务的大石水泥公司的董事长，他当年登高一呼成功创办南洋大学的壮举赢得新马侨胞的拥戴，后来他因选举倾向被新加坡政府吊销公民权，一九八〇年，南大改名换姓，失去华文教学的传统。

一九三八年底，日寇封锁我海上交通，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唯一陆上运输通道，次年二月，国府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卡车驾驶和维修人员回国援助，三千多名马来亚及新加坡青年立时响应，组成十五批队伍陆续出发经海路赴昆明，新加坡的九批机工约二千人于怡和轩集合出发。滇缅公路全长一千一百余公里，机工们冒着日机轰炸，日夜不停地驰骋于崎岖艰险的公路上，三年内总共抢运了四十五万吨以上的军用物资到西南大后方，一千多名机工因被炸、疾病、车祸而为祖国牺牲。抗战胜利后，九百多名机工分批返回新马，另约八百多人决定在国内定居，不幸，这批留下来的爱国侨胞在文化大革命时竟遭到无情的批斗迫害，被扣上“蒋帮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打成了“叛徒、走狗”。

去年是南侨机工回国抗敌七十周年，新马、昆明、海南各地均有纪念仪式，活下来的机工均已年逾九十，虽然官方改变立场颂赞他们的功勋，然冤屈而死的他们已无从得到任何心灵抚慰。我在怡保工作的十四年间，与南侨老机工们组织的公益团体“华工服务社”的一些朋友颇有来往，听到许多关于他们的英勇故事。

新加坡匆匆此行，既享受连士升夫人米寿欢庆之喜，又有幸见识到发扬中华文化的孔子学院，致力公益与社团和谐的怡和轩，以及缅怀华人领袖泽被全侨的先贤馆，可谓满载而归。这些可敬的民间组织各负使命默默耕耘，发光发热，照亮了南洋的华人社会，温暖了南洋华人的心。【二〇一〇年二月七日补记于新加坡】

## 注释

---

- 1 《食货》半月刊合订本，共精装五大册，上海书店（上海一九八二）。
- 2 何兹全〈悼念我师陶希圣先生〉，《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二期（台北一九八四）。
- 3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典藏版（北京图书馆），页 68，连士升青少年文学基金会丛书，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出版（新加坡二〇〇九）。按：这间图书馆的前身是“国立京师图书馆”，一九二八年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一九五〇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
- 4 桑巴德（德）：Werner Sombat；克拉判（英）：John Harold Claphan；西摩勒尔（德）：Gustav von Schmoller；约克曼（英）：William T. Jackman；斯密亚丹（英）：Adam Smith；费（英）：C.R. Fay；卫布思夫妇（英）：Sidney and Beatrice Webb；格拉斯（美）：N.S.B. Gras。
- 5 参阅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陶恒生译注《深入虎穴—高宗武回忆录》，《传记文学》第九十八卷第五期起连载八期（台北二〇〇六/二〇〇七）。
- 6 从一九三九年六月五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廿一日，陶希圣从香港给何兹全写过二十七封信。见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附录：〈陶希圣致何兹全书信集〉。
- 7 参阅连士升《回首四十年》典藏版〈越南的隐居〉。
- 8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典藏版〈多难的越南〉，页 178。
- 9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典藏版〈又要逃难了〉，页 195。
- 10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典藏版〈谈科学救国〉，页 54。
- 11 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述评》第三章〈连士升文学在新马社会的可行性〉，页 103。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二〇〇七）。
- 12 参照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述评》附录〈连士升资历年鉴〉，页 212。
- 13 陶泰来《陶希圣年谱》（未刊稿）。沈苏儒是陶希圣的女婿，他和陶琴熏于一九四六年在上海结婚，原任上海《新闻报》记者，大陆变色后在北京外文局工作，琴熏于一九七八年病逝，苏儒于二〇〇九年六月病逝。
- 14 参阅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述评》〈第五次访谈内容整理〉，页 194—195。
- 15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连士升百年诞辰纪念》〈连士升创作一览表〉（新加坡二〇〇七）。
- 16 《海滨寄简》八集的书名，出自唐王勃《滕王阁序》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见许福吉〈长河落日圆〉，《海滨寄简》第八集《长天集》〈序〉，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二〇〇七）。